

纪念恩师吴征镒院士

雷立公

(1964~)，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1992~1995年就读吴征镒院士博士研究生。

恩师吴征镒院士仙逝已近周年了！所里也在向各位弟子征稿好长时间了，却迟迟没有动笔，眼看征稿截止日期就在眼前，再不写点就说不过去了。

相比之下，我自2002年6月调回昆明植物所以来，与先生见面的机会并不如读博士期间的多，主要是先生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容不得过多的打扰，况且先生的耳朵越来越背，说话必须大声，总觉得有大不敬之嫌。

恩师在世的最后几年，从黑龙潭的所部的家搬到城里去住，就很少能有机会见到恩师了。期间有几位国家领导人来所视察，所里专程将恩师接回标本馆，在等待的过程中，与恩师有短暂的交流，还特意与先生合过影。

这里我就写写先生对我影响较大的几件小事，以志纪念。

1990年5月23日，我在原西北植物研究所完成了硕士研究生毕业答辩，6月4日在西北大学完成了硕士学位答辩（当时的西北植物研究所还没有学位授予权，只能与西北大学合作培养研究生，由西北大学授予学位，因此，基础课程学习都在西北大学生物系完成，学位论文工作回西北植物研究所完成），当时已经确定一定要读博，而且就想考吴征镒院士（当时还叫学部委员）的，但因家里经济困难，决定先工作两年再说，于是，硕士毕业就留在西北植物研究所工作了。

确定考吴征镒先生的博士生，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的硕士导师之一张遂申先生经常给我提起吴先生，他让我知道了“吴老当”，让我更加了解了吴征镒先生当时在国内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我的硕士论文研究对象胡椒目的植物尤其是齐头绒就产在云南南部，而且在1989年5月专程到云南采集实验材料，其时也首次到访过昆明植物研究所，有感于西北植物研究所的差距，决心报考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博士，当时植物分类学研究方向，也只有吴征镒先生一个博士生导师。



2006年5月14日，与吴老在标本馆合影（后排左起：杨永平、孙航、李德铎、雷立公、周浙昆）

在硕士学位答辩结束后不久，1990年6月上旬，时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一个最大的（资助金



额360万元)重大项目“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研究”的北方片工作会议在兰州兴隆山召开,虽然当时我与此项目并无瓜葛,但张遂申先生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的机会,资助我参加了这次会议。

兴隆山相对于被荒漠包围的兰州而言,确实是很难得的林区,植被茂密,植物种类较为丰富。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跟当时的大多数刚踏入植物学之门的年轻人一样,第一次知道王荷生和李恒两位知名的学者竟然都是女的。中山大学的张宏达教授竟然很能爬山,当我们大多数人还在山脚下时,他已经从山顶下来了。

会议期间,在兴隆山深处的马衔山实地考察,这次吴征镒先生也去了。我们年轻人都不放过这个机会,个个拿着标本争先恐后地向各位前辈讨教,但是要向吴先生讨教,还是有些怯生生地。我采到一种开黄花的毛茛科植物标本,很快就被吴先生要去了,他告诉我植物的名称,可惜我很快就忘了,现在想起来,这是一个莫大的缺憾(我应该查一查标本馆的标本,看看究竟是什么植物)。当时我就当面告诉吴先生我准备考他的博士生,他回答说可以。6月13日,会议上准备了一个大蛋糕,说是要为吴征镒先生过生日,应该是75岁的生日。庆生仪式开始后,吴征镒先生说他是属龙的,问在场的还有没有属龙的,我说我是。说来凑巧,在场的年轻人中属龙的就我一个。

这就算是我与吴先生的缘分吧!

会议之后,我就一边工作,一边复习,做考博的准备了。到了1992年6月,来昆明参加考试,认识了同样报考吴先生的彭华(另外还有一位姓王的,是来自云南教育学院的,与彭华是大学同学,一位姓马的来自新疆)。回去不久,我就接到录取通知书了。总算是正式入师门了!

二

1992年9月,我直接从陕西杨陵的西北植物研究所去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习英语和政治课。1993年3月,回到昆明植物研究所,刚好赶上区系大项目的阶段工作会议,直到会议结束后,才与吴征镒先生商讨博士论文选题问题。他为我设了两个选题,一个是秋海棠属分类修订,一个是胡椒目的系统学,他倾向于后者,因为我硕士论文就做胡椒目的形态解剖学,现在正好可以扩展到系统学,于是就确定了下来。4月份就去西双版纳采集实验材料,半个月之后,回所里报销差旅费,在还课题本时,先生看着课题本,无奈地说:“怎么花了这么多啊?”实际上,这趟差总共花费一千多一点,然而,当时先生的课题本上也就只有几千块钱,360万的区系大项目的课题经费按五年分配到全国几十家研究所和大学的课题组后,吴先生虽然是大项目的负责人,但落到他手里的经费也没有多少。而且,当时正处于中国科研的低谷时期,尤其是当时中国科学院的处境也很尴尬,科研经费极度缺乏。为了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顺利进行,吴先生帮忙从中国科学院的生物学特别支持费拿到了二万五千元的经费,后来我实际上只使用了其中的五千左右。

在做论文期间,吴先生要求我们在遇到问题时及时找他,不过要提前电话预约时间,并且归纳好要讨论的问题。这就训练了我们处理问题的条理性。虽然,这期间吴先生已经没有时间像对师兄们那样亲力亲为、手把手地教我们研究方法了,但每次跟他探讨问题,他都会教我们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相应要读的文献。

论文答辩前,吴先生亲自选定北京大学的李正理教授和胡适宜教授以及西北大学的胡正海教授作为我的论文的函评人,要求我根据函评意见和他提出的建议逐一认真修改,修改稿经过他认真细致地审查后,才提交答辩申请的;答辩委员会请北京植物所的路安民教授和云南大学的杨貌仙教授,也都是有深意的,因为路安民教授是当时国内植物系统学的知名学者,而杨貌仙教授在植物形

态解剖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且治学极为严谨，从中都体现出吴先生治学的严谨。

三

1995年6月，我博士毕业，去湖南师范大学工作。临行之前，我去向先生辞行，先生就我到了湖南后的科研方向提出了指导意见，希望我能继续做系统学方面的工作，但他认为这在地方大学是比较艰难的，他要求要根据湖南的植物区系的特点去选题，并且要以应用研究为出发点，才能争取地方上的经费支持。

现实也是如此，当时湖南省科技厅的基金项目的资助强度也只是一万五千元左右，而且各单位都有数量限制，初来乍到的外来人是很难申请得到的。在具体的研究内容方面，要我对双牌泡果芥做应用性研究，因为，这种植物的主要化学成分无论是含量还是组合都优于当时湖南南部山区广泛栽培的山蓴菜Wasabi，可以作为替代种植作物，而其分类上也存在疑问。然而，多次申报，均因上述原因而未能成功。

还有一次，湖南神堂山发现大片的穗花杉林，当地人告知吴先生，先生想到了我，写信给湖南的林业主管部门，希望资助我对此进行研究，结果他们转而资助其他单位的人去做了。

四

在到湖南长沙不久，我前妻因水土不服患上紫癜性肾炎，每年需要至少三次住院治疗，虽然学校报销大部分住院费，但报销比例逐年下降，期间院系组织职工捐款救助，缓解了一时之难，但她因为生病而无法工作，因此就没有收入，一家人的生活费及她的医药费全由我微薄的工资负担，一度陷入极度的困难当中。

吴先生知道之后，拿出一千元钱委托彭华寄给我，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的困难，当时的一千元钱已经不是小数目了。

五

吴先生曾试图利用各种途径将我调回昆明植物研究所，但囿于当时科学院的改革以及其他原因都未能如愿。

2001年底，我受师兄彭华之邀，来昆明联系调动，先是去西南林学院联系，当对方知道我前妻的情况后，就有些不情愿了。于是我再回到昆明植物所来拜会吴先生，吴先生叫时任副所长的李德铤师兄带我去见当时的所长郝小江，基本确定了调动的意向。据知，之后不久，当时的科学院副院长陈宜瑜院士来所里视察，吴先生当面向陈宜瑜院士提出调我回来的事，此事就算有了肯定的结果了。

2002年2月，我前妻病故后，所人事处打电话告知我调动的事，要我4月份参加标本馆主管的竞聘。竞聘结果出来后，我就在所里负责标本馆老馆改造工程的准备工作即标本搬迁。直到准备工作安排好后，才回湖南长沙办理调动手续。

回想起来，若不是吴先生关心、帮助，当时我很有可能渡不过难关；若不是吴先生设法（当然还有彭华和李德铤两位师兄的鼎力相助）将我调回昆明，我也就没有如今还算幸福的生活。

恩师的眷眷之心，令我感激涕零！

吴先生，我永远怀念您！

